

# 范成法师行状

◎ 孔 勤



范成法师俗姓李,清光绪十年(1884)生于江苏如皋。年7岁于本邑崇善庵依悉融和尚出家,读书认字,礼佛诵经。22岁始赴镇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,戒期圆满即回如皋掘港西方寺住持悉融师父座下,晨钟暮鼓,禅门课诵,打坐出坡,应赴经忏。宣统二年(1910)江苏省僧教育会于南京创办僧立师范学堂,法师奉命负笈入学受教,与仁山、智光、惠敏等同学相聚一堂,恭听谛闲、月霞等大师讲授佛言祖语、世出世法,言传身教,道风德行,法师耳濡目染,心领神会,誓愿继承、传播佛教文化,荷担如来家业。后因辛亥战事影响,学堂停办,肄业返寺。辛亥革命成功,中华民国肇建,法师奉命主持西方寺法席,率领海众开垦寺产荒地数十亩种植庄稼,农禅并重,保障常住道粮无匮。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,募捐化缘修筑掘虹路和兴建通利桥,改善掘港对外交通,方便家乡父老出行。在寺内择地砌造纳骨塔,荒郊野地无主骸骨有归宿矣。民国十六年(1927)法师创建皋东私立僧伽图书馆,

馆藏佛教大小乘经律论典籍、儒家经史子集、地方志乘等各种图书逾十万册以及各类报刊杂志十数种,设专人管理,对社会开放。在当时当地规模当称可观矣。民国十八年(1929)法师策划在当地设立佛教文物馆,馆藏业已收集或拟征集之金石经像法器供具等佛教文化遗产。但因缘不具足,未能成事实。

民国二十年(1931)夏,陕西遭遇自然灾害,朱子桥居士(朱庆澜将军)至西安地区放赈,在开元、卧龙二寺复见(民国初年康有为先生游陕时已发现)《石砂版大藏经》(简称《石砂藏》,因刊版于南宋平江府陈湖中石砂延圣院而得名,故又称《延圣院本》),视为稀有法宝。于是设想影印发行流通。返沪后即与社会名人、佛教护法叶恭绰等居士商议,决定成立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。朱庆澜、叶恭绰为正副理事长,范成等13人为常务理事,林森等34人为名誉理事,熊希龄等49人为理事,费范九为驻会办事主任,其它办事人员29人。影印宋版藏经会随即与陕西西安当局接洽商谈影印《石砂藏》事宜,双方议定当年10月开始运作。初拟借原本运沪摄影,因恐途中损失经本难以赔偿,后经研究决定拍照底片运回上海影印。于是通过会议全权委托法师率领上海有正书局技师技工20余人,携带照相器材抵达西安,经与地方相关部门有关人士协商,将开元、卧龙二寺《石砂藏》运至陕西省立图书

馆清理、检点、摄影。迨至民国二十一年(1932)9月告竣,并将藏经底片装箱待运。适值倓虚大师从西安启程前往宁波观宗寺,于是因缘会遇引发一代宗师舍生忘死护送释藏经典故事。

宋《碛砂藏》,经元代续刊及有明补刻,全藏共收佛典1532部(一作1518部)6362卷。开元、卧龙二寺存有此藏7437卷,经对比甄别除雷同者外,尚有5226卷,全部拍制玻璃版(底片)分装60大箱,请倓虚大师护送至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(会所上海威海卫路714号)后,法师又接受重托前往山西名寺古刹寻访珍本,补足二寺《碛砂藏》短缺经卷,力求完善影印传世,惜乎“均无所获”。民国二十二年(1933)春,法师在西安幸遇朝礼五台山归来之性空老和尚告知:山西赵城广胜寺有四大橱卷轴式古版藏经。法师闻此消息,欣喜不已,立即登程再赴山西,及至广胜寺一看,竟有六橱《金版大藏经》(简称《金藏》),如获至宝,喜出望外,迫不及待着手整理。依据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(简称《至元录》)对照橱中所藏经卷逐一检点登记,历时三月完成。又得悉寺邻不少人家也有此藏零本,乃张贴启事:“如有存此藏经者,可送广胜寺供养,免放家中褻渎,每卷可得代价银壹角。”与此同时法师亲自登门访问劝化,征集回收近300卷,总共4957卷。法师从《金藏》中找出《碛砂藏》所缺典籍400余卷,又因《碛砂藏》传世年深岁久,经本每有残损,其中《般若》、《宝积》、《华严》等大部经典尤为严重,难以影印。法师访求北平松坡图书馆、云南昆华图书馆、福建鼓山涌泉寺、山西晋城青莲寺、江苏南通狼山广教寺等处珍藏的《资福藏》、《普宁藏》、《毗卢藏》(再刻)、《永乐南藏》等不同版本,以及采用康有为先生、叶恭绰居士等家藏善本,配补《碛砂藏》同名残损和短缺经本多达780余卷,可谓鞠躬尽瘁,不遗余力。民国二十三年(1934)采访摄制圆满完成,从而确保《影印宋版碛砂藏经》顺利出版发行。

宋版《碛砂藏》,每版经文30行,每行17字,折为5页,每页6行。版框有天地边线,长约56公分,宽约24公分,装潢为梵夹本。千字文编号每函一字,一函装经十本(个别“小经”例外)。影印《碛砂藏》为四开横式线装方册本,原经版本一函缩印成一册,每册约80页左右,每页录原版经文两版,即页上和页下各一版。书口处上栏注影印宋碛砂藏经,中栏注题名;下栏注页次、册次。每册版框线长约48公分,宽约11公分,每十册为一函,每函首册有扉画及本册目录。凡591册,合成59函。另有目录、附件二册,合为一函,共计60函。至此《影印碛砂藏》大功告成,由此开创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和汉传佛教藏经印刷史上新纪录。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副理事长叶恭绰居士《影印宋碛砂藏经》首册之一之“跋”云:“采访摄影,奔驰各地,历三年,悉范成法师之力。”同样,民国二十四年(1935)初,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平三时学会,从《赵城藏》(即《金藏》,因卷首扉画释迦如来说法图标有“赵城县广胜寺”题字故名)中选出极其罕见之经典49部、249卷,改卷轴装为方册本出版发行之《宋藏遗珍》,亦可谓法师之力。因鉴定、整理、报告《赵城藏》者,乃影印《宋藏遗珍》之增上缘也。北平三时学会将《金藏》中完好无缺之《楞严经》原经原版原装(卷轴)影印400部,分藏名山大寺,亦复如是。

民国二十一年(1932),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中山陵筹建藏经楼,保存佛教大藏经。当时佛教界公认历代大藏经中《清藏》(又称《龙藏》、《乾隆版大藏经》)“收罗宏富,去取严谨,校核精当,行款整齐”,且此藏经版保存尚属完好,卷帙可谓无损,遂于民国二十四年(1935)初发起重印一部(藏)珍藏供养,诸山长老、名寺古刹、佛教团体、社会名人随喜请印14部。国民政府对此极为重视,专门制定《释藏经典领印规则》,对领印《清藏》方方面面作出具体规定(如每户限印一部,每部定价法币3200

元;领印者需申述领印理由,呈请内政部核准;每部需缴纳领印费500元,存柏林寺作修理经版及印经时杂费之用)。经国民政府批准,由内政部于同年10月公布,二十五年(1936)5月对此《规则》有所修订后正式施行。中国佛教会于同年6月14日为领印释藏经典事呈文内政部:“释藏经典包罗广博,我国所存柏林寺释藏经版片,在清代校刻最精,迄无阙损……请准予领印。”国民政府文官处于次日,为清藏印刷事致函范成:“希即前往内政部接洽”。法师随即赴内政部经过面商有关事宜并接受使命。中国佛教会于同年同月21日,正式委托法师赴北平主持重印清藏事务,圆瑛会长亲自出具委托书开列所有委托条件,方便印刷事务顺利进行(当时也有舆论声称法师受林森主席委托主持其事。如《大美晚报》,即有“主席派人赴平重印大藏经”之说;国民政府文官处致法师函也有“主席同意共印15部”之言)。不出5天法师就带领办事人员到达北平,下车伊始即与市佛教会、市社会局、市古物陈列委员会接洽协商,定于7月1日于柏林寺(《清藏》经版库在此)成立“丙子印刷清藏事务所”。与此同时,法师与北平本立堂书店订立印刷清藏合同;又与北平大成泰纸庄订立购纸合同。27日即将所办手续一并呈送国民政府内政部备案。同日法师致电林森主席:“应办手续已妥,专待内部通知开工,乞就近催部迅予施行。”7月1日,丙子印刷清藏事务所宣告成立。是日,北平古物陈列委员会负责人陪法师偕办事人员开启经(版)库,进行洒扫经库、整理经版、维修经架等具体工作。9日,法师致电林森主席:“经版整理洗毕,各事俱备,专待内部公事,乞就近催蒋部长电平钱主任,以便开印。”由于国民政府内政部、北平古物陈列委员会未及时发出开印指令,7月30日,法师致电国民政府文官处:“筹备早经就绪,专待内政部令到达开印”,“因此次印刷部数甚多,恐延至冬季刷

印,诸有不便,请转呈主席,恳催部速发,俾便开印,以免工人旷置,应速着手为宜”。因为内政部仍未就此作出反应,8月11日,法师又致函国民政府文官处要求尽快开印。同时呈文北平古物陈列委员会,请求先行开印。如此双管齐下果然见效,8月18日获准开印清藏。22日,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函法师,表示林森主席同意共印15部,未便再议增加。这表明中国佛教会首次呈请内政部备案领印之14部和李子宽居士补办手续增印之一部释藏经典已获内政部核准。同时表明内政部也得悉又有申请领印释藏经典者之信息矣。

民国二十五年6月,中国佛教会为请求免缴领印费事向内政部呈文:鉴于社会经济极形凋敝,领印释藏之寺院募集经费至为困难,按释藏领印规则第三条规定,每部应缴纳之领印费500元,拟请免予呈缴。为此,内政部蒋作宾部长致函林森主席,表示对于每部之应缴领印费,拟由部专案呈请核免。8月5日,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函法师,告知行政院已准予免缴15部释藏经典领印费。其间,太虚大师、叶恭绰、唐慕汾居士、美国大使福开森4户领印4部,法师呈文内务部请求核准。9月7日,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委员长,偕高占魁、邓哲熙等要人莅临柏林寺清藏印刷现场参观,之后宋氏领印4部,法师也为之办理手续呈请内政部核准。9月17日,文官处为增印清藏事致函法师:“请求增加之4户,虽不在免费之例,亦未尝绝对不许印刷,但领印费应先缴纳。”法师就此多次呈文国民政府林森主席、文官处、古物陈列委员会请求免缴领印费。迨至民国二十六年1月13日,内政部致函文官处:“所请添印藏经,既系连同前经核准付印之15部一并付印,自可援案免缴。”后来宋哲元委员长认印之4部清藏,也经内政部批准付印并免缴领印费。至此请印释藏经典者20户领印23部。最初14部领印者汉口古德寺、苏州灵岩寺、北平广济

寺、嘉定凌云山大佛寺、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 5 户,因筹措经费困难,无奈放弃。杭州灵隐寺、净慈寺等 5 户,有幸替代请印。法师统理参与印经事务者,昼夜六时刷印经版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八块(每块经版长二尺四寸,宽九寸,厚一寸一分,两面刻经文,每面 425 字,两面 850 字,共计约有一亿三千多万字),重印清藏 22 部(美国大使福开森领印一部,拟陈列国家图书馆,因未获美国政府认可,故未开印)。一如初版装潢为梵夹式折子本(每版经文 25 行,折为 5 个半页,每半页 6 行,每行 17 字),《千字文》编排函号,每函一字,装经十卷,自“天”字起至“机”字止,共 724 字,计 724 函,合 7240 卷,不出一年大功告成,重印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。领印释藏经典者闻讯皆大欢喜,分别前来作礼致敬迎请法宝。圆瑛法师一部奉献中山陵藏经楼,戴季陶先生一部赠送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,定安、却非、钦亮、大愿、倓虚、虚云、慧开、善青、太虚、继峰、诚湘 11 位法师各一部,各自供养各自常住,分别为云南某地云楼寺、杭州灵隐寺、杭州净慈寺、浙江某地弥陀寺、山东青岛湛山寺、广东韶关南华寺、上海觉园法宝馆(佛教图书文物馆)、安徽某地乐善寺、湖南宁乡密印寺、湖南某地千明寺、湖南某地白沙茅篷,李子宽、叶恭绰、唐慕汾、宋鹤庚 4 位施主各请一部珍藏所在单位,分别为湖北汉口佛教正信会、上海法藏寺、北平私立佛教图书馆、湖南嘉坪佛教正信会,宋哲元先生 4 部就地各得其所。法师完成使命、所作皆办后,奉请一部南下江苏,送至如皋掘港西方寺,珍藏僧伽图书馆。从而继影印宋版《碣砂藏》之后,又一次实现传播佛教文化,保护佛教文物之愿望矣。

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后,8 月 13 日(八·一三事变即淞沪抗战),日军又侵略上海。中国军队奋起抵抗,战争惨烈(日机狂轰滥炸),阵亡士兵及罹难民众甚多。中国佛教会组织僧伽救护

团之后,又成立上海僧侣掩埋队,圆瑛会长任总队长,范成法师任第一队长,慧开和尚任第二队长。两队队员来自上海玉佛寺、法藏寺、清凉寺、国恩寺、关帝庙、报本堂等大寺小庙僧侣和香工,都是自愿报名参加者。每日早晨集合一起,分乘 4 辆汽车,车上备有绳索、竹杠、铁锹、担架等掩埋工具,队员各自携带防毒面具、消毒药品、食物饮料等奔赴四郊战场掩埋遗体。傍晚回到佛教同仁会和法藏寺食宿。每天朝出晚归历数十日,总计掩埋遗体不下万具。在腥风血雨、悲愤交加中掩埋死难同胞,乃菩萨行也。在淞沪抗战期间,上海佛教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(简称慈联会)设立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,法师积极投身难民救济工作。上海沦陷以后,战事西移,各地逃难来沪者甚众,本埠难民亦伙。1940 年春,流落公共租界者数以万计。佛教界慈善家胡松年、乐慧斌居士等,在印光法师赞助下,发起成立佛教同仁会,公推兴慈法师、范古农居士为正副会长,胡松年为办事处主任。法师为同仁会负责人之一,统理难民救济事宜。首先协调各方创办施粥处,办法是募集经费若干,印就粥票(券)若干张,订成小簿,向社会各界劝募认购,同时特约全市热心善举之粥店 40 余家,为同仁会施粥供应处,凡持有粥票者即可至指定粥店吃粥(每票一碗)。法师黎明即起前往各个粥店了解情况,督促及时施粥。风雨无阻,每日如此。自同仁会成立至 1942 年底的 2 年半中,施放粥票累计 770 余万张,无数饥饿者获得一饱,有幸逃过死劫。尤其是 1941 年 8 月,日军封锁上海南市难民区期间,同仁会一面向日军部交涉,准予运粮前往救济,一面向社会各界募集馒头、大饼、面包等食品,送往南市分发赈济,每日受赈者七、八千人。是时,法师正在南市关帝庙办事处忙于救济事宜,废寝忘食奔走难民区七天七夜。迨至日军解除封锁,才得以放心喘息。淞沪战事结束,大部难民回乡,施粥对象主



要为上海贫民。至 1945 年免费吃粥者约有一千万人,挽救生命不知其数。同仁会除施粥外,其它善举择其大者有三:一是 1940 年以来沪西及新加坡路棚户区屡遭火灾,每次都对灾民进行救济。一是 1941 年安徽九华山灾情严重,劝募善款后前往放赈。一是 1942 年始,向上海各界劝募净财补助杭州寺庙老年及贫困僧尼,至 1945 年同仁会支出救济经费数千万元。小规模扶贫济困以及每夏发放万金油、痧药水、小食品等慈善之事不胜枚举。仅施粥一事法师即做了五度寒暑,功莫大焉。

1945 年 8 月,日本无条件投降,中国抗战胜利。上海佛教界为此举行庆祝大会,并在会上向抗日将士赠送面巾(用四千万元购得大批面巾,上印“上海佛教徒敬赠面巾”字样)。同时,上海各大寺院为国家祈祷祝福,并为超度阵亡将士、死难人民举办法会 3 天。法师参加抗战胜利庆祝活动后即归如皋掘港西方寺。1946 年夏,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,人民解放战争开始,江苏境内地处长江北岸之南通、如皋一带,发生国共两党军队交火,枪林弹雨过后双方战地都有阵亡者遗体。法师见状于心不忍,乃发起组织缙素掩埋队就地埋葬。局势动荡,气氛紧张,无心统计其数矣。之后即隐居常州武进安家舍德胜寺,为演

慧、传明等学人传授中国历史地理知识和佛教文化,尤其是汉文佛教大藏经版本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法师移锡苏州沧浪亭结草庵,遂将庵内数亩空地辟为菜园,实践农禅生活。1950 年,苏州市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,特聘法师为委员。1952 年,参与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工作,当选为主任委员。1953 年 5 月下旬,中国佛教协会举行成立会议,法师偕侍者传明赴京出席,当选为理事(因赴京途中列车紧急刹车,法师正在餐车就餐,从座椅上滑落到地上大腿骨折,在京治疗数月返回苏州)。此外还曾担任政协委员、人民代表等公职。1957 年 2 月 26 日至 31 日,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,法师再次赴京出席会议,仍当选为理事。是年夏开展反右派运动,法师被“戴帽子”,划归“黑五类”,成为批判斗争对象。1958 年冬,一生弘扬和保护佛教文化及热衷社会慈善事业之普通一僧,拄着拐杖撑住患有哮喘痼疾身躯回到如皋掘港西方寺。获悉僧伽图书馆所有图书早就化为纸浆,馆藏佛教文物也业已损失殆尽,老人痛心疾首,扼腕太息不已。未几旧病突发,转瞬垂危,12 月 17 日尽业报身归安养矣。世寿 75 岁,戒腊 54 夏,著有《历代刻印大藏经略史》等传世。

(作者为范成法师弟子)

#### 参考资料:

- 1、游有维:《上海近代佛教简史》。
- 2、倓虚:《影尘回忆录》。
- 3、李富华、何梅: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。
- 4、吴一菲:《范成法师》,百度百科(2008 年)。
- 5、孔萍:《范成法师》,百度百科(2010 年)。
- 6、陈金龙:《南京国民政府与〈清藏〉的印刷》  
(孔萍 2010 年摘自百度百科《佛教文史》)。
- 7、孔勤:《传明回忆录》。

